



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

《摩经》译注与研究

伍文义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

《摩经》译注与研究

伍文义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译注与研究 / 伍文义编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81135-995-4

I. ①云… II. ①伍… III. ①布依族—原始宗教—宗教经典—研究—云南省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2530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 张: 44.375

彩 插: 8

字 数: 116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批准号 06BZJ017，结项证书号 2010101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鉴定等级：良好

项目主持人：伍文义

主要参加人：罗祖虞 周国茂 郑坚强

项目顾问：吴启禄

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

佛 山 大 学 资助本书出版

佛山大学政法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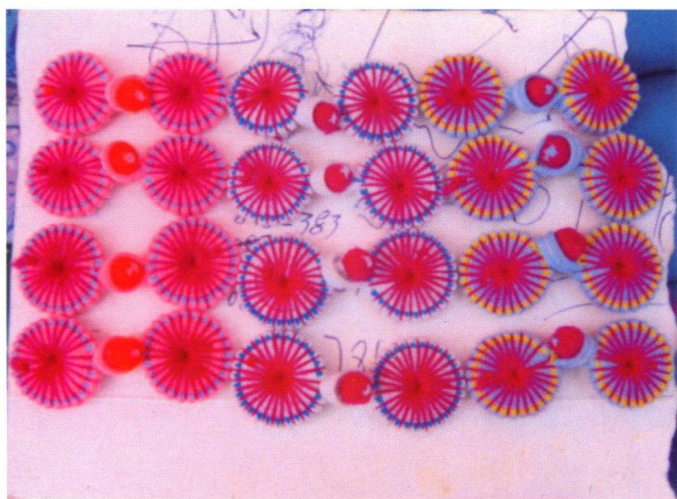
云南布依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布依族人的生活(之一)/伍文义摄



云南布依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布依族人的生活(之二)/伍文义摄



云南布依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布依族人的生活(之三)/伍文义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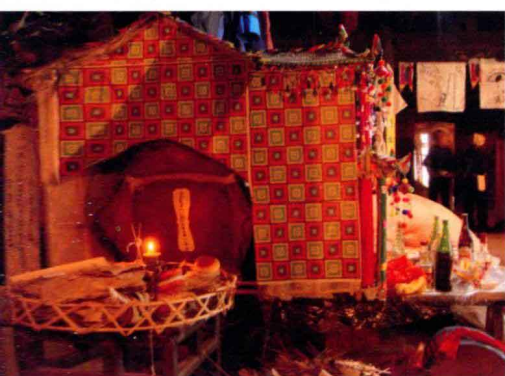
布依族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布依族人的生活(之四)/伍文义、罗祖虞摄(左下两图转引自罗祖虞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布依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王云奎、胡良辅提供的图片)



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与祭祖仪式中的“大竹图腾崇拜”/伍文义摄



布依族用牛祭祖仪式中的“大竹图腾崇拜”（之一）/伍文义摄



布依族用牛祭祖仪式中的“大竹图腾崇拜”（之二）/伍文义摄



布依族用牛祭祖仪式中的“大竹图腾崇拜”（之三）/伍文义摄

内容简介

本书《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译注与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立项批准号 06BZJ017，结项证书号 20101018。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鉴定等级为“良好”。编著者经过长达四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边远山区，收集拍摄了经书原文全部图片，并在当地农村根据“布摩”先生的念诵与解释，对经文逐字逐句进行布依语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意译和注释，总共破译了《摩经》达八部之多。

在《摩经》研究中，编著者坚持“汉藏语系一语三族”的历史语言学观点，即坚持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侗泰、苗瑶、藏缅”三个语族。汉藏语系族群在我国分布最广，人数最多。其中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或壮侗语族）又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族群，布依族即汉藏语系侗泰语族的主要民族之一。编著者认为布依族来源于古代“东夷”、“百越（粤）”、“南粤”、“蛮夷”、“西南夷”等，既然承认他们是原始汉藏语系族群的分支，研究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就不能将南、北文化截然分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古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水稻文化、竹文化、鸟文化、青铜文化等即为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的文化之源，甚至黄河流域旱地粟作农业中的鸟文化、蛙文化、鱼文化也可以在布依族《摩经》中得以传承。例如，布依族《摩经》中有《祭山经》、《祭水经》，汉族则有《山海经》或《山经、海经》，这种类型对应不是偶然的，当是汉藏语系族群先祖的文化遗产。《摩经·祭山经》认为“越人（布依族先祖）、汉人、苗人”与“龙神根源”，都来源于创造人类的祖神——“燕鸟（玄鸟、凤凰）王神”，此即诸民族同源观与山神崇拜礼仪的记载；“越人（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壮侗语族）、汉人、苗瑶人”同为汉藏语系族群，“龙神、燕鸟（玄鸟、凤凰）”亦同为汉藏语系族群的主要文化符号，这是中华汉藏语系族群同源的《摩经》历史文献依据。其与《山海经》、《楚辞》、《国语》、《左传》、《尚书》、《史记·封禅书》、《礼记·祭法》等相关记载和考古成果相吻合，说明了《摩经》中“燕鸟（玄鸟、凤凰）”图腾信仰与山神崇拜的密切关系，道出了《摩经·祭山经》历史文化之久远。其他如对“树文化”、“燕鸟文化”、“大竹文化”、“青铜文化”、“语言、文学、艺术”等《摩经》文化的深入考证，亦充分地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共性与布依族文化个性特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由此，编著者提出：“研究我国任何民族文化，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能将南北文化截然分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否则民族传统文化就可能成为文化的孤岛……我们提倡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各民族传统文化，注重文化共性与个性并存，这既能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水平，也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从而增强国家、民族凝聚力。”这一方法论和学术观点的提出是很有价值的。

序 一

《摩经》是学界公认的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唐宋以来，在汉文化影响下的布依族人创造性地运用汉字音韵和偏旁部首，记录原有布依族传统宗教的《经词》，以此作为祭师“布摩”先生在宗教仪式中唱诵的经书，从而传承了布依族的历史文化，这些转录的经书被称为《摩经》。它集中反映了布依族先民对日月星辰、天地山川、先祖神圣、古代氏族的观念与社会生活实际，不仅具有宗教学史料意义，而且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哲学、伦理学、民族科技、语言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经过长达四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边远山区，收集拍摄了经书原文全部图片，并在当地农村根据“布摩”先生的念诵与解释，对经文逐字逐句进行布依语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意译和注释，总共破译了《摩经》达八部之多。在全面、科学、系统地占有《摩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书还对《摩经》的宗教仪式场景和若干文化专题，进行了多学科结合的细致考证与研究，从而揭开了《摩经》的神秘面纱。

近年来，有关民族文化的论著不少，但是它们在论述这些民族历史的时候，往往缺少本民族的文献引述。最近，我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作学术考察，发现这些地区的古文献材料很多，不仅有西双版纳老傣文、德宏老傣文，还有古彝文和古布依文等。由于现代学者不认识这些古文字，目前还不能加以引用，实为憾事。伍文义是一位布依族学者，对本民族的热爱萌发的使命感，是他研究本民族文化的初衷。他又是一位语言学家，这使得他能够成功地破译古布依文。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两者互为表里。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分析文化现象，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反之，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分析语言，方能洞察语言的历史深度。这就是这本著作能够达到如此的学术广度与深度的原因。我乐为之序。

潘悟云

2011年8月20日于上海师范大学

序 二

学术研究的发展一般都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掘新的史料；一是采用新方法，新的方法并提出新的学术观点。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译注与研究》一书可以说是一本既具有新的史料，又有新方法、新观点的著作。《摩经》是学界公认的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是唐宋以来布依族人创造性地应用汉字音韵和偏旁部首为符号，将原有布依族传统宗教的《经词》记录下来，作为祭师“布摩”先生在宗教仪式中唱诵的经书，从而传承了布依族历史文化，称为《摩经》。经书集中反映了布依族先民对日月星辰、天地山川、先祖神圣、古代氏族观念与社会生活实际，不仅具有宗教学史料意义，对人类学、历史学、伦理学、民族科技、语言学、文学艺术等学科也很有学术研究价值。

作者在《摩经》研究中坚持“汉藏语系一语三族”的历史语言学观点，即坚持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侗泰、苗瑶、藏缅三个语族。汉藏语系族群在我国人数最多，占全国人口的95%以上，其中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或壮侗语族）又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族群。布依族即汉藏语系侗泰语族的主要民族之一。作者认为，布依族来源于“东夷”、“百越（粤）”、“南粤”、“蛮夷”、“西南夷”等，既然承认他们是原始汉藏语系族群的分支，研究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就不能将南、北文化截然分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古代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水稻文化、竹文化、鸟文化等即为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的文化之源，甚至黄河流域旱地粟作农业中的鸟文化、蛙文化、鱼文化也可以在布依族《摩经》中得以传承。

作者还提出：研究我国所有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能将南、北文化截然分开，更不能将南、北文化对立起来，否则单一民族传统文化就可能成为文化孤岛；应该提倡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研究各族传统文化，注重文化共性与个性并存，这既能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能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一方法论和学术观点的提出是很有价值的。

该书的作者通过长达四年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边远山区农村根据“布摩”先生的念诵与解释，对经文逐字逐句进行布依语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意译和注释，总共破译了《摩经》达八部之多，并附上经书原文图片。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对《摩经》的宗教仪式场景和若干文化专题，进行了多学科结合的细致考证与研究。由此，作者以敏锐眼光审视布依族《摩经》的中华文化背景，为探寻布依族《摩经》文化找到了广阔的研究平台。作者在如下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于“布依族《摩经》的山文化研究”。作者认为布依族《摩经》中有《祭山经》、《祭水经》，汉族则有《山海经》或《山经、海经》，这种类型对应不是偶然的，当是汉藏语系族群先祖的文化传承。《摩经·祭山经》认为“越人（布依族先祖）、汉人、苗人”与“龙神根源”，都来源于创造人类的祖神——“燕鸟（玄鸟、凤凰）王神”的汉藏语系诸民族同源观，并有关于龙神崇拜与山神崇拜礼仪来源的记载；“越人（侗泰语族，亦称侗台语族、壮侗语族）、汉人、苗瑶人”同为汉藏语

系族群；“龙神、燕鸟（玄鸟、凤凰）”亦同为汉藏语系族群的主要文化符号；这是中华汉藏语系族群同源的《摩经》历史文献依据。著者进而结合《山海经》、《楚辞》、《国语》、《左传》、《尚书·舜典》、《史记·封禅书》、《礼记·祭法》等相关记载，吸取考古成果及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将《摩经·祭山经》内容置于中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认为《摩经》中“燕鸟（玄鸟、凤凰）”图腾信仰与山神崇拜有着密切关系，道出了《摩经·祭山经》历史文化之久远。

布依族《摩经》祭“天神、山神、图腾祖神”是在高山顶设祭坛祭祀，可能是因为布依族先民们崇拜祈求“天神、山神、图腾祖神”保佑就是直接向“山”祭祀。这与《尚书·舜典》所言“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辑五端，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川”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周人用作祭山的牲畜主要是“牛、羊、猪三牲”，其中“牛最为贵重”。此礼当传承着夏、商王朝甚至更远的尧舜部落联盟之礼仪。布依族祭祀“天神”、“山神”也主要用“牛、羊、猪三牲”与“米酒”、“花糯米饭”，显示了稻作民族的特点。因此，布依族《摩经》的此种礼仪，即是华夏礼仪文化之传承。

关于“布依族《摩经》的大竹崇拜文化研究”。作者根据布依族《摩经·用牛祭祖词》中“大竹崇拜”的记载，结合布依族传统中的“舅家送竹即送子、人由竹生”的“保福”仪式、小孩出生“三朝栽竹”等“生育满三朝”仪式；以及年老仙逝的超度仪式上“立大竹神位”，“祖灵归入大竹神位、升上天堂”等大竹图腾崇拜的宗教仪式，特别是在田野调研过程中，先后三次遇到布依族同胞举行隆重的“用牛祭祖”的丧葬超度宗教仪式，于是翻山越岭，踏着崎岖山路赶赴现场调研，晚上跟着乡亲们熬更守夜竟然不觉得累，这是科学研究事业心使然吧。由是作者拍摄到“用牛祭祖”宗教仪式的三组珍贵图片，用第一手资料形象地阐明了布依族的“大竹图腾崇拜”文化，并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作者还指出，类似布依族“大竹图腾崇拜”的丧葬宗教仪式，在我国南方汉藏语系族群许多民族中都有存在。通过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我国南方汉藏语系族群“竹崇拜”文化，体现了如下特征：第一，竹崇拜是汉族、布依族、傣族、仫佬族、彝族等汉藏语系族群的共性文化，主要表现在生育文化、丧葬仪式之中。其竹崇拜文化的一致性，说明汉藏语系各族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第二，竹崇拜文化以“竹”作为竹图腾崇拜标志物，在表现形式上又有不同类型特征。因此，作者参考考古学对旧石器文化之区分，即“大型砾石器”、“微型细石器”的分类方法，提出我国汉藏语系兄弟民族的竹图腾标志物，明显地也可分为“大型大竹”图腾标志物、“微型小竹”图腾标志物的两种竹崇拜文化类型。

汉藏语系族群的彝族竹图腾文化属于“微型小竹”图腾文化类型，且用“小竹”与他物共同组成祖灵牌“玛都”。彝族的竹图腾文化因是微型，如果不经解释，一般人从外观上是难以识别和理解的。汉藏语系族群的汉族、布依族、傣族、仫佬族这四个民族的竹图腾文化则属于“大型大竹”图腾文化类型。这种竹崇拜文化类型因保留原竹的高大枝干，且竹尖留有几层竹叶，在特定的宗教仪式上“大竹”标志高大而明显，从外观上不经解释一般人都能识别和理解。这就是“大型大竹”图腾和“微型小竹”图腾两种文化类型的区别。如此细致、扎实的比较研究，前人是没有做过的。

指出我国汉藏语系族群的“大竹图腾崇拜型”、“小竹图腾崇拜型”的差异，当源于自然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尽一致，但两者同为中华汉藏语系族群竹图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作

者的重要学术观点。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是“竹的文化”。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也认为中国的文明是“竹子的文明”。^①

对于《摩经》中的“树文化、舟船文化、鸟文化、青铜文化”等专题研究亦然。《摩经》文化既可分类研究，然实为浑然一体。如《摩经》的青铜文化，包括了青铜农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三类。不仅有“铜桩”、“铜柱”、“铜板”、“喇叭口铜器”、“铜锣（铙）”、“大口铜锣（铙）”、“铜铎”、“铜锄”、“铜扇”、“铜刀”、“铜剑”、“铜鼓”等器物，还有铜矿开采、冶炼、铸造全过程。其中又有“大象崇拜”、“虎崇拜”、“龙崇拜”、“鸟崇拜”、“竹崇拜”等内容穿插其间，需要认真甄别梳理。特别是有使用“铜棺”、“铜鼓”安葬祖先，如《摩经·用牛祭祖词》（第一卷）《铜棺经》“铜衣（铜棺）”、“赤铜棺”、“青铜棺”、“双铜棺”、“用铜棺送祖去广阔仙界”的记载，等等。作者以数十年布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经历与积累，对《摩经》的诸文化事项，逐项进行了细致考证。从《尚书》、《诗经》到二十四史、地方史志、族谱；从考古资料到民族史、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名著；从《摩经》本身的文化事项，到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与拍摄的实证图片，旁征博引，循序渐进，学理清晰，语言畅达，立意高远，读后令人为之振奋。

《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经〉译注与研究》全书洋洋一百余万字，是一本全面、系统、很有学术价值的《摩经》译注与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并顺利通过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结项鉴定。项目主持者伍文义教授是我的朋友，对他多年的勤奋、严谨与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我感到由衷高兴！对于布依族的《摩经》我没有涉猎过，相关的评价也不一定到位，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我对伍文义教授及其团队的敬意。

是为序。

周大鸣

湖南湘潭人，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等兼职教授

2011年9月30日于中山大学

^① 引自何明：《中国竹文化小史》，《寻根》1999年第2期。